

试论《庄子》的“游”观念与魏晋隐逸之风

马艺珈

贵州大学哲学学院，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2026年6月5日；录用日期：2026年7月21日；发布日期：2026年7月28日

摘要

庄子提出的“游”观念本是一种精神自由的哲学境界。至魏晋时期，政局动荡、玄学兴盛，隐逸成为士人普遍选择的生活方式。本文考察“游”观念如何在魏晋时期与隐逸之风相结合，成为隐士行为自我诠释的思想资源，并分析观念转化为生活实践的具体路径。研究表明，魏晋隐士并非机械复制庄子，而是有选择地借用“游”观念来赋予自身行为以超越性意义，完成了从哲学命题到生活方式的历史转化。

关键词

庄子，“游”观念，隐逸之风，《晋书·隐逸传》

On the Concept of “You” in *Zhuangzi* and the Hermit Trend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Yijia Ma

School of Philosophy,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June 5, 2026; accepted: July 21, 2026; published: July 28, 2026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you” proposed by Zhuangzi was originally a philosophical realm of spiritual freedom. By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political turmoil and the rise of Neo-Daoism (Xuanxue) had made reclusion a common lifestyle choice among the literati.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the concept of “you” was integrated with the reclusion trend during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becoming an intellectual resource for recluses to interpret their own behavior, and analyzes the specific pathways through which this concept transformed into practical living.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recluses of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did not mechanically replicate Zhuangzi’s ideas; rather, they selectively borrowed the concept of “you” to endow their actions with transcendental meaning, thereby completing a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from a philosophical proposition to a way of life.

Keywords

Zhuangzi, The Concept of “You”, The Reclusion Trend in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The Book of Jin*, Chapter “Yinyi”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庄子所标举的“游”观念，包括“逍遥游”“游心”“游乎尘垢之外”，本是一种超越世俗、追求精神自由的哲学境界[1]。逮至魏晋，玄风鼓荡，政局板荡，隐逸遂成为士人普遍采纳的生活方式。本文旨在考察“游”观念如何在魏晋时期与隐逸之风相互渗透、彼此生成，进而成为隐士自我诠释与实践的精神资源，重点分析这一观念转化为生活形态的具体路径。研究时段集中于魏晋(约 220~420 年)，取径观念史与社会行为史的交叉视域，以期揭示哲学思想如何历史地落实为生活方式的深层机制。

2. 庄子“游”观念的核心内涵

《庄子》中“游”的涵义丰富，与本文主题直接相关的有三种。其一是“逍遥游”，出自《庄子》首篇篇名，指一种无待的绝对自由境界，如“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完全不依赖任何外在条件[2]。其二是“游心”，指精神的自由遨游，如“游心于淡”“游心于无穷”，强调内在心灵的安顿与超脱[3]。其三是“游乎尘垢之外”，这里的“尘垢”喻指世俗的礼法、功名、是非、利害，“游乎尘垢之外”即超越这一切世俗束缚[4]。

需要指出的是，庄子所说的“游”首先是精神层面的境界，而非具体的行为方式[5]。大鹏虽飞九万里，列子虽御风而行，在庄子看来仍是“有所待”的，并非真正的逍遥。真正的“游”是一种无待的、绝对的精神自由。有学者将庄子之“游”划分为“游于物”“游于心”“游于混沌”三种层次：游于物是有待于客观条件的活动状态；游于心是主体精神的自由遨游；游于混沌则是超出主客对立的终极境界[6]。也有研究从实践角度区分为“外游”(游于物)、“内游”(游于心)和“至游”(游于道)三种形态[3]。尽管学界对“游”的层次划分存在不同表述，但“游心”作为庄子精神自由的核心形态被广泛认可[7]。不过，本文不做哲学辨析，而是提取其中与隐逸行为相关的特征：对世俗价值的否定、对精神自由的强调、个体性与超脱性。这些特征恰恰为后世隐士提供了自我理解和自我表达的思想资源。

3. 魏晋隐逸之风的社会背景

魏晋时期隐逸之风大盛，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首先是政治的极度黑暗。自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诛杀曹爽开始，司马氏与曹魏集团之间展开了残酷的权力斗争，大批名士被卷入政治漩涡而丧命。何晏、夏侯玄、嵇康、吕安等人先后被杀，嵇康临刑前弹奏《广陵散》的悲剧，成为魏晋士人心中难以磨灭的创伤[8]。在这样的环境下，“全身远害”成为士人的首要考量，隐逸成为避祸的重要方式。

其次，经济基础的变迁为隐逸提供了物质条件。两汉以来的土地兼并加速了豪强地主经济的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庄园经济、坞壁经济和寺院经济。世家大族凭借其经济实力和政治特权，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门阀体制。在这一体制下，部分士族成员拥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和家族庇护，不必完全依附于皇权俸禄，这为他们选择隐逸提供了现实可能[9]。

再次，隐逸本身也是士人与皇权之间的政治博弈手段。隐士与皇权之间存在着“无所不在的紧密关系”：皇权一方既要“用隐士来装潢门面”，又要避免隐逸之风可能产生的不安定因素；隐士一方既要追求独立意识，又不得不承认为人君之臣民的现实^[10]。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正始玄学，以《周易》《老子》《庄子》为“三玄”，开启了清谈之风。此后，向秀、郭象注《庄子》，进一步提升了庄子在士人中的影响。《庄子》中关于逍遥、齐物、无用的论述，为隐逸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精神支撑^[1]。隐逸不再是单纯的逃避，而有了一套完整的哲学话语作为正当性说明。

再次，魏晋时期的隐逸已有多种形态。有完全避居山林、拒绝与统治者接触的“山林之隐”，如孙登、董京、郭文等；也有身在朝廷而心在山林的“朝隐”，如王戎、谢安等。无论哪种形态，隐逸者都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提供解释——不是简单的怕死或逃避责任，而是一种更高的人生选择^[11]。正是在这一点上，庄子的“游”观念发挥了关键作用。

4. “游”观念对隐逸行为的塑造

魏晋隐士在表述自己的隐逸行为时，频繁借用《庄子》中的“游”观念^[12]。“游乎尘垢之外”“游心”“逍遥游”等词语成为他们自我诠释的核心话语。以下从三个层面分析这种借用关系。

第一，“游乎尘垢之外”与隐士的世俗疏离。庄子所谓“尘垢”，包括世俗的礼法、功名、是非、利害。“游乎尘垢之外”意味着彻底超越这些世俗的羁绊。魏晋隐士在行为上极力表现与世俗的疏离，并自觉地将这种行为与庄子的“游”建立联系。孙登是这一类型的典型代表。据《晋书·隐逸传》记载，孙登隐于汲郡北山，穴居野处，夏则编草为裳，冬则披发自覆，“性好读《易》，抚一弦琴”^[13]。当时权臣司马昭曾派嵇康从游三年，问其意，孙登始终不答。嵇康临别时问“竟无言乎”，孙登才说：“子识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于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识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4]孙登以沉默和隐逸避免了卷入政治，时人评价他“游心太虚”——这正是一个直接借用庄子“游心”话语的表述。

类似地，董京也是“游乎尘垢之外”的实践者。他“常宿白社中，时乞于市，得残碎缢絮，辄结以为衣，号曰‘百结衣’”。^[13]他披发行吟，逍遥于市井之间。作诗云：“乾道刚简，坤体敦密……万物皆贱，惟人为贵。动以九州为狭，静以环堵为大。”^[13]这种以天下为狭、以斗室为大的境界，正是庄子“游心”观念的体现。孙登、董京等人的行为表明，他们通过远离人群、拒绝社交、不事产业等方式，实践了“游乎尘垢之外”，并将自己的行为与庄子的哲学话语直接联系起来。

第二，“游心”与隐士的精神自足。庄子所说的“游心”，是精神在无穷中的自由遨游，不依赖任何外物。这一观念对魏晋隐士尤为重要——当他们放弃功名利禄、过着简朴甚至贫苦的生活时，需要一种精神上的支撑来消解物质匮乏带来的不安。“游心”恰好提供了这种支撑：物质的贫乏不可怕，只要精神能够“游”于自足之境。

郭文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据《晋书》记载，郭文“少爱山水，尚嘉遁”^[13]，隐居余杭天柱山，“倚木于树，苫覆其上而居焉，亦无壁障”^[13]。他卖药为生，与虎为邻，生活极其简朴。当时名士王导曾将他请到家中居住，郭文“颓然箕踞，傍若无人”^[13]。有人问他为何不出仕，郭文的回答体现了典型的“游心”思维：“夫山野之人，以天地为栋宇，以日月为牖牖，以星辰为珠玑，以万物为资给。居处岂有定处哉？但以心为安耳。”^[13]这段话直接呼应了庄子“游心于淡”的思想：真正的家不是外在的屋宇，而是内心的安顿。只要“心”安了，哪里都是自在的。郭文将庄子“游心”观念转化为一种生活态度：不必追求物质上的富足，精神上的自足才是真逍遥。

另一个例子是夏统。据《晋书》记载，太尉贾充曾想劝夏统出仕，命人摆出仪仗队、歌女舞伎以诱惑他，夏统不为所动。贾充又问他：“卿居海滨，颇能乘舟乎？”^[13]夏统于是乘船水上，唱起《慕歌》，

歌中有“逍遥游于江湖”之句。贾充感叹说：“此吴儿是木人石心也。”^[13]夏统以“逍遥游于江湖”来回应出仕的诱惑，将江湖生活本身诠释为一种逍遥——这正是“游”观念从精神境界向具体生活方式的转化。

第三，“逍遥游”与隐逸的审美化。到了东晋时期，“逍遥”一词的使用更加普遍，但其内涵已从庄子的哲学境界降维为一种生活姿态。这集中体现在“朝隐”观念的出现——身在朝廷、心在山林，不需要真的离开官场，只要内心保持一种超然物外的态度，就算是逍遥了。

向秀、郭象在《庄子注》中提出的“适性逍遥”说，为这种降维提供了理论依据。他们认为，只要各安其性、各适其分，无论是大鹏还是小鸟，无论是帝王还是乞丐，都可以是逍遥的^[14]。这一解释大大降低了“逍遥”的门槛：不需要达到庄子的“无待”境界，只要满足于自己的处境，就算是逍遥。这种解释在士人中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得“逍遥”成为一种可以普遍适用的生活态度。

张翰的“莼鲈之思”是这方面著名的故事。《世说新语·识鉴》记载，张翰在洛阳为官，“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15]他的名句“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将“适意”置于名利之上，这正是对“逍遥”的世俗化理解。张翰并没有去深山老林，他只是辞官回乡，过自己喜欢的生活——在魏晋人看来，这已经是逍遥了。刘伶的“以天地为栋宇”也是类似逻辑，他把放达任诞视为逍遥，虽然刘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隐士，但他的行为代表了当时士人对“逍遥”的普遍理解。

以上案例表明，魏晋隐士对庄子“游”观念的使用是有选择性的。他们并没有追求庄子所说的“无待”境界，因为那在现实中几乎不可能达到。相反，他们选取了“游”观念中与世俗疏离、精神自足相关的方面，将其转化为可以实际操作的生活原则。庄子哲学中极高的精神境界，在魏晋隐士这里被“降维”为一种可以言说、可以模仿、可以安顿身心的话语体系。“游”因此不再仅仅是一种哲学概念，而成为一种社会身份的标志。谁能够“游”，谁就超越了凡俗，进入了名士或隐士的圈子。

5. 结语

“游”观念从庄子的哲学命题转化为魏晋隐逸的生活指南，经历了一个从精神境界到行为姿态的“降维”过程。庄子所说的“无待”原本是极难达到的理想境界，但魏晋隐士将其改造为可以实际操作的生活姿态：他们通过远离世俗来实践“游乎尘垢之外”，通过内在安顿来实践“游心”，通过审美化的生活态度来实践“逍遥游”。隐士们借助这些话语，为自己的退隐提供了正当性与诗意表达。

这一转化反映了特殊历史语境下士人对庄子思想的实用主义态度：在政治黑暗、生存压力巨大的环境中，他们不追求绝对的“无待”，而是借“游”之名安顿身心、保全性命、维系尊严。从这个意义上说，魏晋时期的“游”观念不再仅仅是庄子的“游”，而成为魏晋士人应对特定历史处境的精神工具。魏晋之后，“游”与隐逸的关联成为中国士大夫文化的持久主题，直至唐宋仍不断被吟咏和书写，其影响可谓深远。

参考文献

- [1] 包兆会. 论庄子之游[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 2003, 40(4): 82-89.
- [2] 张海珍. 《孟子》与《庄子》“欲”观之比较[D]: [硕士学位论文]. 济南: 山东大学, 2025.
- [3] 孙敏明. 庄子“游”的人生哲学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杭州: 浙江大学, 2011.
- [4] 李琪. 魏晋南北朝诗的《庄子》接受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24.
- [5] 张万民. 游于气、神游与游观: “游”的审美精神与艺术表现[J]. 中国文学批评, 2025(5): 84-94+159.
- [6] 魏航. 庄子之“游”的方式与境界[J]. 现代哲学, 2009(3): 125-128.

-
- [7] 任芳, 许元政. 论《庄子·逍遥游》之“游”[J]. 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22(3): 37-39.
- [8] 谭立. 论“魏晋风度”形成之独特环境和个体因素[J].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4): 402-404.
- [9] 宁稼雨. 魏晋隐士的仕途智慧[J]. 领导文萃, 2016(7): 93-97.
- [10] 刘红红, 张玉春. 从“逍遥游”到“人境庐”——论庄子思想与传统士人出世隐逸人格在魏晋时代的确立[J]. 孔子研究, 2010(4): 93-101.
- [11] 王小燕. 魏晋隐士美学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天津: 南开大学, 2010.
- [12] 张志宏. 《庄子》“隐逸”观于中国文化之影响[J]. 求索, 2010(12): 128-130.
- [13] 刘洪生. 《庄子》内篇之间的结构关联[J]. 商丘师范学院学报, 2015, 31(1): 31-38.
- [14] 房玄龄, 等. 晋书卷九十四·隐逸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15] 郭庆藩. 庄子集释卷第一上·逍遥游[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